

数字赋能下巴蜀非遗纪录片的文化记忆书写与共同体建构

陈舒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9日

摘要

在数字化背景下, 巴蜀非遗题材纪录片通过视听媒介对非遗进行创新呈现与当代表达, 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活化与再创造。此类纪录片以影像方式记录非遗技艺、传承人故事及其文化价值, 唤起观众的地域归属感与文化认同。研究基于影视叙事学与文化记忆理论, 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与案例研究等方法, 梳理巴蜀非遗纪录片的叙事机制, 揭示其在保存文化记忆的同时, 如何建构关于巴蜀地域的文化记忆共同体。

关键词

巴蜀非遗纪录片, 文化记忆, 数字化, 非遗

Digital Empowerment of Bas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cumentaries: Cultural Memory Writing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hu Chen

School of Media and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April 26, 2026; accepted: May 18, 2026; published: May 29, 2026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Bas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documentaries use audiovisual

media to present ICH innovatively and through contemporary expressions, achieving the activation and re-cre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ontemporary context. Such documentaries record ICH skills, inheritor stories, and their cultural values through cinematic means, evoking viewers' sense of regional belong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film narratology and cultural memory theory,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textu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o sort out the narrative mechanisms of Bashu ICH documentaries, revealing how they construct a cultural memory community of the Bashu region while preserving cultural memory.

Keywords

Bash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cumentary, Cultural Memory, Digitaliz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增进文化认同是维护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的关键纽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文化认同最直观的外在表现，承载着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记忆与集体意识。巴蜀非遗作为中华文化中极具地域特色的分支，包括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技艺、传统戏剧、曲艺等类型，它们既承载着巴蜀地区的历史记忆，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瑰宝。本研究中所指的数字赋能是指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交互技术等数字手段为支撑，对非遗纪录、叙事表达、传播分发进行全链路升级，实现非遗文化的活化呈现与高效传播。文化记忆共同体则指通过共享的影像符号、情感纽带与价值认同而凝聚起来的社会群体。本研究将文化记忆共同体的衡量维度界定为三个方面：首先，符号共享度，即受众对巴蜀非遗纪录片中地域符号，如自然景观、方言等的识别与认同程度；其次，情感共鸣度，即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的共情反应与归属感；最后，身份认同度，即受众通过纪录片内容强化自身作为巴蜀文化传承者一员的自我定位。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到来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巴蜀非遗题材纪录片以工艺流程、民俗仪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为拍摄对象，不仅借助影像载体对濒危非遗项目与文化记忆进行抢救式记录，而且在内容上不断创新，挖掘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核与情感表达，为巴蜀非遗的传播和保护作出贡献。本研究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与影视叙事学，系统梳理巴蜀非遗纪录片中的文化价值、发展历程、叙事策略与数字传播路径，探究巴蜀非遗纪录片对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与塑造文化记忆共同体的内在机制，来认识影像作品对于传承和传播巴蜀非遗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丰富非遗影像传播的理论体系，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强化地域归属感与文化认同、促进文化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2. 巴蜀非遗文化记忆的影像书写与理论基础

(一) 巴蜀非遗文化的独特性与文化记忆的价值

林向先生在《“巴蜀文化”辨》一文中指出，广义的“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1]。该界定为本文阐释巴蜀文化提供了方向性的依据。在文化多元交融的当下，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巴蜀这一特殊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历史积淀与地域特色，积累了深

厚的文化资源，涌现出李白、杜甫、苏轼、诸葛亮等著名的历史人物，孕育了丰富多样且极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巴蜀非遗文化在中国多元的非遗文化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川剧变脸、蜀绣织造、峨眉武术、自贡灯会、大足石雕、川江号子再到鸣堂等文化遗产，蕴藏着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内涵，也塑造了巴蜀人坚韧乐观、幽默豁达、勇于创新的群体性格，这种地域精神深深烙印在非遗形态之中。近年来，纪录片《非遗里的中国》四川篇、重庆篇《四川非遗 100》《非遗中国·重庆瑰宝》《非遗珍宝在成都》《中国影像方志：四川安岳篇》《手艺：妙笔永青》《了不起的匠人：穿越两千年的蜀锦密码》《巫咸技忆》等一系列影像作品，凭借形象可感的视听语言、现代的科技手段和创新的叙事视角将“巴蜀非遗文化”加以诠释，展现巴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其在新媒体时代语境下拥有新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这些形态各异、内涵丰富的巴蜀非遗，本质上正是巴蜀人民集体文化记忆的核心载体。1988年，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他指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2]。他强调文化记忆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命，通过社会性媒介，如仪式、文本、图像、纪念场所等，代代相传的集体性记忆，是维系群体文化认同与塑造身份认同的关键力量。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非遗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价值愈发凸显。它不仅保存了历史的基因密码，更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屏障。如今数字时代的到来，许多纪录片以巴蜀非遗文化作为纪录对象，以尊重真实性为本体，通过影像表达的方式为巴蜀非遗文化记忆的保持与激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促进了巴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二）巴蜀非遗纪录片的历史发展与美学特征

有关“巴蜀非遗文化”的纪录片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有40多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涌现了涉及巴蜀非遗题材的纪录片。《中国一绝》纪录片每集时长10分钟左右，内容涵盖川剧变脸、掺茶、自贡灯会等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一绝》起到了知识科普的作用，向观众介绍了巴蜀地区丰富的非遗项目。早期的巴蜀非遗影像严格遵循“客观纪录”的本质，这一时期的非遗题材纪录片在深度和广度上存在局限，主要侧重于对非遗项目的简单记录和展示，而针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情感表达相对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工作者很早就发现了影像对于传播非遗文化价值的重要作用。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相关政策逐渐出台，为巴蜀非遗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2000年至2010年的巴蜀纪录片以表现巴蜀人民生活、巴蜀地域风貌为主，其中不乏有巴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在叙事方式上采用大量的解说词和人物采访，以传统的电视媒介进行单向传播和接收。2005年的《巴渝古镇·盐殇》通过讲述巴渝古镇盐业的兴衰，展现了当地的社会变迁和制盐文化的传承。2010年，随着《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国产纪录片在文化传播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越发明晰，推动了纪录片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涌现了诸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纪录片作品，如《寻找手艺》《传承》《指尖上的传承》《了不起的匠人》《了不起的非遗》等系列非遗专题片。2021年，《“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呼吁全国各地以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形式普及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及其保护意义，巴蜀非遗纪录片发展进入井喷期，呈现出作品数量多、精品化、多元化的趋势。数智化背景下，非遗文化爱好者纷纷加入保护非遗的队伍，致力于探索纪录影像的呈现与创作形式，从宏大主题转向小切口的叙事视角，从单一传播到双向互动方式，非遗类微纪录片的诞生满足了当代受众的审美和观看需求。此外，新时期的非遗纪录片开始尝试突破传统影像的创作边界，显露出跨界融合的创新意识。如梦幻西游游戏公司运用蜀锦制作游戏角色服饰并拍摄蜀锦非遗文化宣传片，实现“游戏IP+非遗”的跨界共创，促进了巴蜀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说新时代的巴蜀非遗纪录片更加注重对非遗项目背后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拍

摄技法更加成熟、情感表达更加深厚、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巴蜀非遗被更多大众所熟知。

新时代以来，巴蜀非遗题材纪录片坚持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统一，以巴蜀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人或技艺活动为纪录对象，为大众展现巴蜀地区独特的风采风貌，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推崇纪实主义美学的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和照相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亲近感。当电影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3]。新时代的巴蜀非遗纪录片不仅注重用客观、冷静的镜头记录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态，还采用多元化叙事手段，不断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保护。

3. 巴蜀非遗纪录片的影像叙事范式：从理论维度解析文化记忆的重构路径

（一）平民化叙事：唤起集体记忆的情感共鸣

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是指基于普通人的第三人称叙事角度，引领观众走进人物内心去真实感悟其生活细节，进而实现情感的交织与传递。利用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展现人文关怀，就是通过挖掘主人公日常生活空间背后的深刻人性，揭示其所承载的人文精神。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非遗纪录片采用趋向多元叙事策略，不断推陈出新，其中平民化叙事已被非遗影像创作者所广泛运用，实现从传统影像的“宏观”权威叙事到“微观个体”生活现场，从聚焦“大主题”到“小切口”的叙事视角转变。以平民化的视角呈现非遗，以微观个体故事重构非遗的文化语境，印证平民化叙事成为现代纪录影像的创作共识。从《口述历史·拾遗》运用大量专家采访“以人说史”的权威叙事解说介绍蜀锦穿越千年的历史发展，到《国家记忆：成都大运会》第三集《生生不息》聚焦典型性的社会事件折射蜀锦整个发展的历史时空，再到微纪录片《那么蜀锦》中再现专家与普通爱好者共同商议蜀锦创新设计的日常生活，这种变化打破了非遗影像小众科普的历史困境，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化场景，有力地拉近了非遗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使得巴蜀非遗纪录片构建起的文化记忆不仅在受众脑海里镌刻下深刻的烙印，也推动产生探索巴蜀非遗的意愿与认同。

非遗项目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具有高度的贴近性，这就为非遗纪录片采用平民化视角提供了天然的切入点。纪录片创作者们从过往全知全能的视角，转变到一种平民化视角，努力捕捉普通市民的生活瞬间，表现平常人、呈现平常事[4]。通过纪录普通人传承和坚守非遗的独特生活故事，挖掘普通个体身上可贵的精神品质，是平民化视角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纪录片《非遗中国·重庆瑰宝》大足剪纸篇中没有将镜头过多地对准大足剪纸深远的历史背景或高超的技艺展示，而是聚焦大足剪纸传承人在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通过对大足剪纸二代传承人庞书麟父女和区级传承人栗未希的采访和讲解，用平实的镜头表现传承者们在工作室里绘制和刀刻剪纸的工作日常，剪纸作品内容源于民间百姓的世俗形象，如牧童、养鸡女、吹笛女，歌颂农家人热爱劳动、善良憨厚的品性。镜头中，通过传承人庞书麟在家中开剪纸培训班、栗未希将剪纸艺术带入小学课堂等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现出传承人对大足剪纸非遗艺术的热爱与坚守非遗传承的执着，让观众看到非遗传承不仅是一项技艺，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不起的匠人》第二季《穿越两千年的蜀锦密码》一集中通过蜀锦匠人贺斌的视角，为观众展现了蜀锦技艺的制作过程和文化价值。贺斌是手工蜀锦织造技艺的传承人，通过他的视角，观众不仅得以窥探蜀锦技艺背后的甩手、设计、点意匠、挑花结本、过花本、打结、挽花、投梭等制作流程，感受蜀锦艺术带来的深厚底蕴，也能直观地了解传承人面临培养徒弟之难、学习蜀锦技艺的不易。

新时代以来的巴蜀非遗影像，在构建巴蜀非遗文化记忆时，愈发注重以小切口破题，依托平民化视角与生活化场景，将作品内容做深做实做细。巴蜀非遗纪录片以这种平民化的叙事方式，记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个体，不仅有利于受众对巴蜀非遗的认识，也唤醒了他们对巴蜀文化的集体记忆。

(二) 故事化叙事：增强文化记忆感染力

纪录片作为纪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影视媒介，保证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存根基，故事化是体现艺术价值的表现形式。通过生动富有情感的故事叙事能够吸引观众观看，加深观众内心情感上与纪录片内容的理解与共鸣，从而更好地让观众深切体会到作品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对于非遗纪录片而言，以非遗本身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为前提，在作品中适当地运用故事化叙事，有利于搭建非遗与观众连接，在动人的情节和沉浸的情感中加速观众了解非遗、重视非遗的过程，同时也避免了纪录片沦为说教工具的桎梏。纪录片在真实属性之上，追求表达的戏剧性，记录生动传神的人物、引人入胜的情节，强化纪录片的感召力[5]。研究发现，近些年巴蜀非遗纪录片创作致力于采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即在尊重纪录片真实记录的基础上，融入戏剧性冲突与情节设计，将巴蜀文化和传承过程故事化，进而增强观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冲突是故事情节发展的矛盾与动力。冲突包括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外部冲突是指叙事主体与外部客观世界的矛盾，核心表现为人与他人和人与环境的矛盾。在非遗纪录片中，其具体体现为年轻传承者的创新实践与老一辈传统观念分歧，或非遗技艺在市场商业化浪潮中的生存困境，这类冲突直接暴露非遗存续的现实困境。如《手艺》第八季《妙笔永青》一集中将四川乐山市永青阁毛笔手艺人汪延兴的故事转化为巴蜀文化集体记忆的符号。该片通过嘉州画院院长余龙委托汪延兴制作几支特殊毛笔为引，揭示老人坚持使用传统猪鬃材料制作毛笔过程的复杂与艰辛，构建了“传承祖传技艺”与“现如今难以养家糊口”之间代际传承的矛盾冲突，强化了匠人精神在现代社会孤独坚守的这一主题。该片结尾段落里展现画家群体在展厅中用汪延兴制作的毛笔绘制具有四川乐山独特地理风貌的山水画卷时的群像写照与老人独自在写作台制笔的镜头巧妙组接，这种具有强烈视觉反差的镜头组合方式将非遗技艺与地方文化记忆相编织，增强了巴蜀文化记忆的感染力，也揭示了非遗技艺在现代快消时代中的生存困境。

内部冲突通常指人与自我的矛盾，是主体在信念、认知与情感间的自我对抗。在非遗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深入挖掘非遗传承人的精神世界，能为纪录片注入情感深度。以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第八集为例，作品将镜头聚焦于四川广安市九十多岁陈功完夫妇的生活故事，即使现在的人们几乎不用印章了，但他们仍然十年如一日守候破旧的瓦房屋，练习刻章，他们表示，“慢慢地做”是两口子秉持一辈子的生活态度。通过陈功完夫妇的故事，观众不仅能够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他们对非遗技艺的坚守和热爱，更能深切体会到非遗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与珍视。

“电影的故事化，让电影成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艺术”[6]。纪录片通过故事化表达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不仅记录了非遗技艺的传承过程，也生动刻画了传承人与非遗之间难以抹灭的深厚情感。巴蜀非遗纪录片以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在讲述传承人生动故事的基础上展现传统技艺的魅力，促进了巴蜀文化的传播。

(三) 沉浸式叙事：科技赋能的记忆重构

自布伦达·劳雷尔于1986年开创性奠基“数字叙事”概念以来，其内涵与外延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而不断深化与拓展。“数字叙事”原指“由网络计算机自动生成故事的叙述表达”[7]，如今，在非遗纪录片创作领域，非遗纪录片以数字特效、AIGC、AR/VR等数字技术为支撑，实现了高水平的视听艺术表达，重构了非遗文化的展示维度，技术美学与沉浸式场景相融合，借助技术拆解解码非遗文化元素，依托数字叙事的介入实现了文化记忆的深度激活与创新重构，进一步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近年来，巴蜀非遗纪录片凭借数字技术手段搭建沉浸式的场景实现了非遗的动态活化，一方面弥补了纪录片相比剧情片而言，自身娱乐性较弱，对观众的吸引力不高的问题，极大满足了观众对影像奇观化、娱乐化的期待视野和感官刺激；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受众可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和弹幕发送的功能，搭建沉浸式的虚拟数字空间，使非遗文化受众打破被动旁观局限，从单纯观看者转变为深度参与的

实践者和文化传承的见证者，并在虚拟数字空间中共同唤醒和重构非遗文化记忆。

《非遗里的中国》第二季四川篇中运用交互投影与实时变脸技术，介绍电子科技大学 UpTeam 团队开发的《川剧电子脸谱》，通过数字绘画的方式，将张飞、曹操等经典脸谱实时投射至人物的面部并进行多种变换，实现“无穿戴变脸”。观众通过手势感应切换脸谱，从观看者变为表演者，突破传统舞台限制，现代科技手段与川剧非遗文化相融合，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从而吸引更多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里的中国》第一季四川篇以秉持“思想 + 艺术 + 技术”的创新理念，广泛运用 5G + 4K/8K + AI、CG 特效、超微距摄影等影视技术手段，为非遗技艺展示赋予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影视表达，使四川非遗文化遗产逐渐“活”起来。如展现自贡井盐深钻汲制、泸州老窖酒酿、道明竹编等工艺流程，均运用实景秀演与虚拟动画的巧妙结合，观众通过影像，实现对非遗思想性、艺术性的理解，体验到了生动、可感的四川非遗美学。

巴蜀非遗纪录片通过将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与现代数字技术巧妙结合，赋予了巴蜀非遗直观化、细节化、形象化的视觉表达，再现历史深远的文化故事和文化遗产，让观众不仅感受到非遗技艺的绝妙非凡、非遗传承人对非遗文化传承任务的执着与艰辛，也在观赏过程中领略到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感受大美的中华质朴理念。

(四) 年轻化叙事：重构非遗记忆的现代表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突破 11 亿人，达 11.08 亿人，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1608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6% [8]。与此同时，B 站平台 2025 上半年热播纪录片的用户画像数据显示，16~30 岁的网络用户占比 55%，可以说纪录片的观看群体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新生代群体成为纪录片受众的主力军。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影响已经悄然渗透到普通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青年群体，在电影、电视、短视频等新兴传播媒介背景下成长，意味着他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观看习惯，都不知不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这就要求非遗影像工作者不断调整和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作品内容和传播方式应当与时俱进，迎合当代民众的口味和审美需求，使非遗年轻化、活态化，才能达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效果。近年来，面向年轻群体的巴蜀非遗纪录片百花齐放，纷纷致力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通过年轻化的叙事手法，根据不同平台的调性，其选题紧密贴合年轻群体的兴趣喜好和价值取向，呈现出作品拍摄对象年轻化、轻体量的特点，契合年轻人的兴趣热点和观看习惯，并将巴蜀非遗的影像创作推至新的高度。

从人物主体来看，新媒体时代下的巴蜀非遗纪录片多以新生代非遗传承人的视角透视巴蜀非遗，激发年轻观众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2021 年在 B 站播出的《非遗传承，少年敢当》非遗题材纪录片以多位“95 后”非遗手艺人的独特视角来观察中国传统的非遗技艺。在首集中将镜头对准成都女孩雁鸿，这位全网视频播放量破千万、坐拥 70 万粉丝的国风手工艺达人，曾因外界质疑决心从零出发，拜师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倪成玉，潜心学习花丝镶嵌这门传统技艺。雁鸿表示，“自己做这样的尝试，第一个是要把技艺传承下来，第二是为了发扬现在的创新精神。”她大胆创新，把易拉罐材料与花丝镶嵌的非遗技艺结合起来复刻古装珠冠等作品，传承与创新相互交织，既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也让青年群体对花丝镶嵌的非遗技艺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体裁形式来看，《非遗珍宝在成都》系列微纪录片在成都发布等平台上线首季纪录片《那么蜀锦》时长精炼至 10 分钟左右，快节奏的剪辑、精心挑选的配乐和炫酷逼真的视觉动画，极大增强了纪录片的观赏性和吸引力。同时，该纪录片巧妙搭配光与色的艺术融合，即成功烘托出蜀锦历史的悠久感，又兼具与现代审美交辉的时尚感。该片最后的画面展现蜀锦织造技艺省级传承人胡光俊先生与成都大学设计专业学生共同商讨蜀锦文创产品设计的场景，无人机俯拍、镜头快切、特写景别的运用，营造出了百年

蜀锦与现代年轻社会的交流对话,使得微纪录片的故事表达更凝练、节奏更明快、画面焦点更集中、更能突出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戏剧性[9]。

以往,传统的巴蜀非遗受地理阻隔与口传心授的单一传承模式限制,流传十分受阻,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数字技术升级,巴蜀非遗纪录片借助新媒体平台优势,不断迎合年轻观众的喜好,运用当代年轻人快节奏、轻体量、强视觉等熟悉的语法内容,使得传统非遗文化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有效促进当代人对传统非遗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4. 数字赋能下的传播路径与记忆共同体建构

(一) 地域符号的具象化表达

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意义的生产,在表征中我们运用被组织为各种不同语言的符号同他人作意义交流。表征是一种意指实践的动态过程,意味着主体的主动选择、呈现、建构和塑造,而不仅仅是现有意义的传播,更多的是使事物产生意义的积极劳动[10]。在记忆生产实践中,传承人的个体记忆因记忆的私人性、地域性、体验性差异,传播范围十分受限。传承人的个体记忆多与自身成长经历深度绑定,且非遗的核心记忆依靠身体肌肉记忆积累的经验,是无法用具象化的文字或语言完整描述,无法直接转化为大众能接收的公共符号,记忆自然难以跨地域、跨群体传播。纪录影像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能批判性地把非遗记忆符码注入特定的文化空间,通过表征实践将非遗相关的文化概念与情感转化为可阐释的符号形式。巴蜀非遗纪录片生动讲述巴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采用代表性、独特性的自然、人文、历史等多元符号进行表征,实现巴蜀文化的意义生产,使巴蜀文化价值得以凸显,唤起巴蜀人民的文化认同和地域归属感。《中国影像方志》四川安岳篇中以凤山书院、奎星阁、安岳文庙等建筑群为符号载体,安岳石雕、安岳曲剧技艺等非遗项目在镜头下展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格,让观众感受到安岳非遗文化与安岳城市历史和社会之间的水乳关系,其不仅呈现了当地人好读书的文化传统,也不着痕迹地表露出安岳地区崇文重教的文化理念。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作为第三种维度的文化记忆,与“一种通过社会交往而保持运转、通过个人记忆而被激活和掌握的集体符号结构有关”。非遗纪录片的记忆场所实质是一个在集体层面照应民族文化身份,联系与之相关的象征符号系统。任何记忆都有其联系的社会框架、文化语境与时代背景[11]。在我国巴蜀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和表现,《魅力四川》《蜀地探秘》《巴蜀画谈》等早期的巴蜀纪录片更多地关注文化遗产的物质层面,如古建筑、历史文物等,让观众一同见证了中国巴蜀文明的繁荣。直至新时代以来逐渐渗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围绕民间技艺、饮食、仪式等传统元素,打造了自贡灯会、大足石刻等汇聚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地。《四川非遗 100》之藏羌毓秀一集中讲述了成都地区藏羌织绣技艺的非遗传承。藏羌织绣作为藏族和羌族的传统技艺,承载着两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藏羌织绣传承人杨华珍将其民族特色与现代元素相融合,打造出更具时尚感和国际范的艺术作品,其中传递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深受不同国家的人们喜爱,也向世界彰显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国家形象。

随着数字技术和传播技术发展和变革,巴蜀非遗纪录片作为一种创新表达方式,其记忆书写效用不断凸显。在这个过程中,巴蜀纪录片不仅在记录遗产本身,也在通过这些文化符号,唤起观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上,起到了构建和强化民族文化身份的作用。

(二) 数字媒介对巴蜀记忆的活态传承

在新媒体平台蓬勃发展的当下,巴蜀非遗纪录片创作正处于深度变革的浪潮之中。新媒体视频平台作为非遗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用户互动性强、传播范围广的特点,这就要求非遗纪录片采用更加直观、更加吸引眼球和灵活的表达方式。例如,通过聚焦于非遗技艺的精湛展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吸引观

众的目光；同时简化对于历史背景的介绍，以便观众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获取核心信息，从而实现非遗文化的高效传播。因此，就非遗纪录片生产创作而言，如何在碎片化传播中探索其记忆建构路径成为关键命题。

近年来，短视频的勃兴深受观众的欢迎。传统的非遗类纪录片由于篇幅较长，宏大的叙事风格和固定的创作套路在快节奏的数字时代下难以引起大众尤其是新生代群体的注意力。因此，越来越多的非遗微纪录片遵循新媒体平台的播放逻辑和观众的接受习惯，凭借时长短、高浓缩的内容、引人入胜的视听呈现和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使非遗微纪录片得到广泛传播，拉近了非遗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构建了新时代非遗影像化的社会记忆。以《非遗珍宝在成都》微纪录片为例，在体裁方面，突破传统的纪录片篇幅过于冗长的窠臼，该片每一集时长均在10分钟左右，并根据目标观众的喜好和发布平台的特点，采用快节奏的剪辑、多重视角、配乐和视觉特效等手法，增强了纪录片的观赏性和吸引力。在内容方面，纪录片内容生产应走在时代前沿，善于捕捉社会热点，聆听和迎合观众的内心诉求。非遗纪录片不仅需要围绕非遗进行宣介和传播，更需要深入挖掘非遗背后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脉络以及社会价值观念，拓展观众的记忆深度[12]。《非遗珍宝在成都》之《蜀绣新意思》一集中展现的内容采用国际化视野，通过外国友人的第一视角来探索蜀锦技艺的过程。从追溯蜀锦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蜀锦的精湛针法、呈现蜀锦技艺代际相传的方式和文化价值到顺应时代发展，最后展现蜀锦衍生产品逐渐登上国际舞台，这种以情感共鸣和文化意义为核心驱动力的记忆构建方式，不仅强化了纪录片的视觉冲击力和观赏性，也为观众构建起富有层次的记忆框架，使蜀绣非遗文化相关的记忆更加深入人心。在传播方面，《非遗珍宝在成都》根据不同媒介的传播调性，构建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平台相结合的多元传播矩阵。其先导片以央视一套为主要播放渠道，借力凤凰网、微博、国际在线、微信公众号等热门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力图全方面多渠道展示纪录片内容，有效拓宽了非遗的可见度，同时观众可通过点赞、弹幕评论、转发等方式在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构建出虚实交融的记忆共生场景，参与到巴蜀文化集体记忆的共建中。

（三）记忆共同体的影像建构

“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13]。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指出，记忆并非个体孤立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的共享认知框架。纪录片作为“记忆的容器”，通过影像符号的系统性建构，能够将分散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可共享的集体叙事。巴蜀非遗纪录片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媒介创造力，在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巴蜀非遗纪录片通过地域符号编码、情感叙事驱动、文化基因激活三重机制，将分散的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构建具有身份凝聚力的记忆共同体。其构建的记忆共同体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对地域文化身份的当代确认。

地域符号作为文化记忆的视觉载体，在纪录片中承担着意义锚定的功能。如《巫咸技忆》第四集《五句子山歌》开篇以航拍镜头展示作为自然景观符号的巫溪兰英大峡谷，这种自然符号的编码并非简单的景观呈现，而是与听觉符号的五句子山歌进行蒙太奇组接，展现巫溪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通过镜头语言的隐喻处理，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认同的“根脉符号”，即兰英大峡谷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居住环境，更成为当地人“依山而居、逐水而歌”生活智慧的视觉图腾。五句子山歌并非单纯的曲调，而是与峡谷的风声、水声共同构成的文化共振腔，形成“非遗+地域”的双重组合符号，这些交织的符号在观众心中刻下巫溪人“以歌记事、以山为家”的集体记忆，全方位反映了巫溪人民朴素的价值观和家庭观。除此之外，语言方言符号强化了记忆的情感黏性。《巫咸技忆》大量采用重庆方言的旁白与访谈，如《五句子山歌》中农人们的“篝火合唱”，重庆方言特有的语调与词汇携带着地域群体的情感记忆，传承着巫溪人的精神和力量。语言符号的编码不仅保留了文化的“原汁原味”，更通过听觉刺激唤醒观众的地域归属感，构建起可识别的地域文化坐标系，使分散的个体经验在共同的语言框架中形成共鸣。

共情传播是一种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和传递、扩散过程[14]。驱动情感的首要动力便是一种具有移情作用的归属感，有共情能力的人能够将心比心，让自己站在他人的立场去思想、去体验、去表达，进而在感情上得以共振，在共情的体悟之中达到理解[15]。情感作为记忆的黏合剂，在记忆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巴蜀非遗纪录片突破了传统非遗传播中“技艺展示”的模式，通过传承人中心化的叙事策略，将个体生命史转化为集体情感的共鸣点，实现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情感迁移。《巫咸技忆》第二集《巫溪烤鱼》没有聚焦于知名传承人，而是记录巫溪街头普通烤鱼摊的日常：食客的闲聊、堂倌的吆喝，这些碎片化的生活场景通过镜头的诗意串联，呈现出非遗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存在，传递“非遗即生活”的理念。片中以张宗成夫妇的创业故事为主线，记录其从普通的烤鱼爱好者到创新烤鱼技艺开店创业的30年历程，通过烤鱼技艺展示、收徒传艺等场景，展现了巫溪烤鱼技艺在代际传递中的坚守与创新，将个体的传承经历转化为“师徒相授”的集体记忆模式，使观众在情感上认同烤鱼技艺非遗传承的历史连续性。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让观众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找到自我记忆的影子，唤醒观众味觉记忆的同时，也将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纳入集体记忆的范畴。

文化基因的激活是记忆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巴蜀非遗纪录片不仅记录非遗的历史形态，更注重展现其在当代社会的创新转化，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使文化记忆在创新中获得延续性。巴蜀道法自然、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在城市发展与时代变迁中得到传承转化，并受到川陕、楚滇等周边文化及近代外来技艺的浸润，形成巴蜀文化中守正出新、匠意天成的心理特质，造就了巴蜀非遗中的精湛技艺和工匠精神。《重庆老手艺》之《巴渝糖画》中运用大量的手部特写镜头展示制作糖画的糖稀材料、工具、手法(提、拉、收、放)、基本功(拉丝、断线)，刻画出独属于巴渝糖画手艺人刘贵兵的精湛手艺，让观众对糖画非遗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影片着重拍摄了刘贵兵立体糖画作品的制作过程，直观呈现出晶莹剔透、造型饱满的巴渝立体糖画，观众在沉浸式体验糖画技艺的魅力，领略到糖画非遗的技术美与艺术美的同时，也能深刻理解巴蜀雕琢匠心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内涵。

(四) 数字赋能巴蜀非遗纪录片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在充分肯定数字技术对巴蜀非遗纪录片传播与文化记忆建构的积极推动作用之余，也必须正视其伴随而来的潜在风险与挑战。数字赋能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它在介入非遗文化记忆书写的过程中，可能引发文化本真性缺失，以及算法推荐机制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等问题。

首先，非遗在数字化传播中面临文化本真性被消解的风险。为迎合碎片化、视觉化、娱乐化的网络传播逻辑，部分巴蜀非遗纪录片倾向于选取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技艺环节，如川剧变脸、蜀锦织造的高光时刻，而对非遗项目背后的历史脉络、社区生活语境进行简化甚至省略。这种去语境化的呈现方式虽然提升了传播效率，却削弱了其作为活态文化记忆的完整性与深度。如何在吸引受众与保持文化本真性之间寻求平衡，是数字赋能背景下亟待解决的命题。

其次，平台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加剧文化记忆中的认知窄化与信息茧房效应。当前巴蜀非遗纪录片主要依托哔哩哔哩、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其内容分发高度依赖于用户画像与协同过滤算法。算法倾向于推送用户已表现出兴趣的同类内容，从而使观众反复接触少数热门非遗项目如蜀锦、川剧，而相对冷门或地域分布更为偏远的非遗项目则难以获得足够曝光。因此，导致部分非遗项目被过度符号化，另一些则面临被遗忘的风险，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

再次，沉浸式数字技术如AR、VR、AIGC在增强观赏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超真实”对“真实”的替代问题。当观众习惯于经由数字特效重构和高度美化的非遗展演时，真实场景中传承人的日常劳作、技艺的试错过程、口传心授的细微情感交流反而可能被视为不够精彩。因此，巴蜀非遗纪录片在运用数字技术时应坚持适度原则，避免过度炫技、形式大于内容，从而遮蔽非遗文化的核心内涵。

数字赋能巴蜀非遗纪录片的文化记忆书写，既带来了传播广度与情感卷入度的提升，也提出了文化

本真性保护、算法多样性与技术适恰性等深层挑战。未来的创作与研究应在数字赋能与文化守正之间建立平衡,使巴蜀非遗纪录片真正成为记忆共同体的可持续建构力量。

5. 结语

新时代的巴蜀非遗题材纪录片不再是单纯的技艺记录载体,而是成为增进文化认同、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共同体的重要影像力。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生态的革新,巴蜀非遗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已然呈现出井喷态势,并以类型化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巴蜀非遗纪录片以生动细腻的影像全面、真实、系统地呈现巴蜀地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益求精的巴蜀非遗技艺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让传统技艺重焕生机,使巴蜀非遗绽放出全新的光芒,成为年轻人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在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构建的地域形象和文化记忆,体现了巴蜀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在数智化时代绽放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 [1] 林向.“巴蜀文化”辨证[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4): 90-94.
- [2]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M]. 季斌, 王立君, 白锡堃,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3.
- [3] 袁慧敏. 传统手工艺题材纪录片的美学特征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3.
- [4] 李忠. 奇观化和平民化: 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创作路径探究[J]. 中国电视, 2019(5): 67-71.
- [5] 史岩, 史哲宇. 历史溯源与现实图景: 关于纪录片故事化的再思考[J]. 中国电视, 2022(5): 73-79.
- [6] 李晶亮.“称量人生”非遗专题片的故事主题表达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工程大学, 2021.
- [7] 成亚生. 新质生产力赋能纪录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智化传承与创新[J]. 中国电视, 2025(4): 59-68.
- [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2025-01-17.
- [9] 廖紫韵. 新媒体时代非遗类微纪录片的叙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中南民族大学, 2021.
- [10] [英]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 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40-41.
- [11] 朱斌. 文化记忆视域下非遗题材电视纪录片研究(2012-2021) [D]: [博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22.
- [12] 王江蓬, 时婉竹. 非遗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建构研究——微纪录片《非遗有新人》的创作实践[J]. 融媒, 2025(2): 21-26.
- [13] 陶东风. 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 中国图书评论, 2010(9): 69-74.
- [14] 赵建国. 论共情传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6): 47-52.
- [15] Hilgard, E.R. (1980) The Trilogy of Mind: Cognition, Affection, and Con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6, 107-117. [https://doi.org/10.1002/1520-6696\(198004\)16:2<107::aid-jhbs2300160202>3.0.co;2-y](https://doi.org/10.1002/1520-6696(198004)16:2<107::aid-jhbs2300160202>3.0.co;2-y)